经济研究

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总结

萧国亮

我首先声明，假如要说总结发言，那不是我一个人，实际上会前我与刘兰兮教授讨论过，发言提纲也请她审阅过。所以，这是和刘兰兮教授共同的总结发言，说错了当然算我的，“语”责自负。

但是，对于这个总结发言我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过去经济类典志开的都是编纂工作会议，这需要把大家的意见总结起来，然后形成几条共识，这有利于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尽量去执行。所以总结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这次召开的不是编纂工作会议，而是学术研讨会。过去我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会，没有一个研讨会是有总结的。大家所发表的宏论都有合理的成份，到底谁是正确的？这只能让历史来做总结，我们怎么能够总结呢？我想这个意见兰兮教授也会同意的。总之，我们的总结是狗尾续貂。在座的都是“曹雪芹”，我们是“高鹗”。但对有些问题，我们想趁此机会谈几点个人的想法，与大家交流。

第一点是这次会议的由来。

这次会议首先是在去年厦门会议上由李伯重教授提出来的，由于编纂《手工业志》遇到清代宏观经济趋势和总体评价的问题，所以他建议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纂修经济类典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建议最后写入了当时戏称为“萧八点”的共识里面，并且还是第一点。当时说在“今冬明春”召开这个会，具体时间大概是在二、三月份，但是，现在已经是“乱红飞过千秋去”的暮春季节了。会议推迟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比较懒惰，办事不够勤勉。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会议有点难度。首先的难度是李伯重教授去年年底给我们发了一份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英文本书稿的第二版，建议作为研讨会的一个文件。这个建议很好！但是，我们觉得把这个英文版发给大家，当然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许多像戴一峰教授那样英文阅读没有任何问题的专家，但也有一些比如像我这样英文很差，可能就读不通。所以为了要保证这次研讨会的质量，我在北大组织了研究生翻译了麦迪森的书稿，而且在三月份还做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校订。但是，在编印会议资料的时候，我们才从管汉晖博士那里知道刚刚出了中文本的第二版，所以这个译稿就不作为会议资料印发给各位了。兰兮教授想得比较周到，她说可以把我们的译本用电子邮件提前发给大家，让大家先看看。当然这个电子版的译本是我组织翻译的。敝帚自珍，在我看来这个译本，翻译得并不比出版的差。其次，我们还要组织会议的论文，而论文的作者也要有一个写作和修改的过程，如燕红忠教授的那篇论文就

[收稿日期] 2008-5-10
[作者简介] 萧国亮（1947—），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改过好几遍，数易其稿，力求精益求精。这些都需要时间。最后，我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一流的专家，有些专家，年事已高，我们要十分关注他们的健康与安全，这其中有许多大家想象不到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我们在典志组组长郭成康教授的领导下完成了这些筹备工作，会议终于在昨天召开了。

昨天开会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突然想到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所说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句话。“群贤毕至”，来参加研讨会的都是当今经济史的高手，吴（承明）老文章中经常说的“时贤”们基本上都来了。而且很荣幸的是戴逸主任也来做了重要的讲话。“少长咸集”，这次会议年纪最轻的是燕红忠教授，仅有32岁。其次大概是管汉晖博士、龙登高教授等，你们后生可畏，生气勃勃，说明经济史研究的事业后继有人。年纪最大的是吴老，耄耋之年，九十一岁。吴老自称是九十初度，真是老当益壮。其次是戴逸主任、方行老先生和魏金玉老先生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都是经济史研究领域德高望重的大方之家。与此同时，还有现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学术中坚如虞和平教授、杜恂诚教授等。此外，承担典志三、四级项目的主持人也都来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是几代学者共聚一堂，共商清史典志纂修中的重大学术问题。这样的盛况一定会被载入清史纂修的历史之中。我们参加纂修典志的教授们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们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无私奉献，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有的还不远千里赶到北京来开会，这种精神更是可嘉。让我代表典志组向“群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点想就研究方法论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首先，对麦迪森的这本书提一些看法，当然李伯重教授是很推崇的。他说：“这是经济史领域的一本大师级杰作。它将成为全世界未来几代学者们所赖以站立的伟人的肩膀。我们中国学者会像从本书的第一版中受益那样，从它的第二版吸取到新的智慧。”李伯重教授对麦迪森研究的推崇我是同意的。尽管我看了麦迪森的书以后和大家一样，感觉到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用的研究方法里面有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这就是数据的透明化。麦迪森说过：“数量分析旨在澄清质量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同质量分析相比，它更容易受到质疑，而且也更可能受到质疑。因此，它可以使学术探讨更尖锐，从而有助于刺激针锋相对的假说的建立，以推动研究的发展。只有使提供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透明化，才可以使持有不同看法的读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或者建立不同的假说。”（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麦迪森对中国经济史的数量研究就是遵循了这一透明的原则。因为研究过程的透明化，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对它的观点进行商榷、补充或者不同意他的数据，或者去建立新的假设。所以，我认为麦迪森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来是科学的。因为证伪主义者波普尔认为，凡是可以证伪的命题就是科学的命题。麦迪森经研究得到的数量命题都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他认为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600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我们可以去证伪，到底是不是600元。通过证伪就有可能把对清代经济的宏观趋势与总体认识深化一步。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今天王玉茹教授、燕红忠教授，昨天的管汉晖博士他们所做的主题发言中，其计量研究也是非常透明化的。如管博士把他的计算方法统统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就可以给他提意见，通过互相探讨，就有可能把问题辩论得越来越清楚。

在20年之前我对麦迪森这样的研究是有怀疑的。其实，麦迪森的最初研究发表在美国《经济史杂志》1983年3月号上，题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水平的比较，1700——1980》，当然他那时的研究与现在相比还不够成熟。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暑期讲习班上，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就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参见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0页）。因为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如关于粮食产量的问题，其中土地面积，首先就很难搞清楚，因为计量单位就不统一，有大亩、小亩，东北是

"垧"；其次是亩产量，有的种小麦，有的种水稻，有的种白薯，有的种高粱，产量多则几千斤，少则几百斤，如何折算？另外，还要考虑到亩产量的地区差别。还有，中国人的数量概念和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相比是不同的，中国人喜欢模糊思维，所以留下来的历史资料中的数量概念是很不精确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中写过一篇叫做《释三九》的文章，就指出了虚数和实数的区别。我们读书的时候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做《多收了三五斗》吗？这三五斗到底是多少，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所以，对中国经济史的历史资料要进行计量研究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后来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了，开始关注这样的研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接触了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二是我发现就是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数据，也有不精确之处，事后还要公布修正后的数据。所以对遵循证伪主义方法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考订历史资料，而悉心研究得到的经济史数据，我们不能过分的求全责备，应该抱着"有比没有好"的态度，批判地加以利用，以此来深化我们的经济史研究。因为观念的转变，所以，我对这次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王玉茹教授、燕红忠教授和管汉晖博士所做的计量研究非常佩服。

但是，我们做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研究，仅仅用计量研究可能还是不够的，还得要以定性研究为基础。正确的方法是应该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假如不结合的话，就会走向反面。比如定量研究中的"反事实度量法"。"反事实度量法"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理论假设的逻辑推理，"推"得好是好，"推"得不好的话，"推"出来的结论是会非常荒唐的。像福格尔的《十字架下的岁月》，说美国南方奴隶的物质生活比个体农场的农民还要好，奴隶吃的食品，营养全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奴隶制经济的效率要比个体农场还要高。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所以，福格尔在美国受到批评，是不可避免的。总之，做定量研究一定要以定性研究为基础，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不会出大的问题。

其次，研究清代宏观经济趋势和总体评价需要宏观经济学的视域。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总体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我们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清代宏观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比如宏观经济学研究的 GDP 指标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总价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GDP 指标是研究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GDP 的计算，是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把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产出以市场价值加总到一起。显而易见，这样的计算并不容易。管汉晖博士的主题发言就是研究明代的 GDP 指标，这个研究可以为清代的 GDP 研究提供学术基础。管博士也表示以后会将他的研究延伸到清代。研讨会上讨论的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表现》就更多地涉及了清代的 GDP 指标。其次比如讨论经济周期问题，燕红忠教授的主题发言就涉及了"康熙萧条"与"道光萧条"等清代经济周期的问题。王玉茹教授的主题发言讨论清代的米价问题，也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宏观经济中的贸易余额问题，在座的陈争平教授是专家。总之，这次研讨会对清代经济宏观趋势和总体评价的研究在计量研究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最后，我们作宏观经济趋势和总体评价的研究，也不能仅见物不见人。其实还有很多因素，比如技术的因素、制度的因素、结构的因素、人的因素等也是不能忽略的，尤其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宏观经济的趋势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绝对不能忽视政府干预的作用。所以郑起东教授的论文也是围绕研讨会的主题的。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会因为一个朝代的变动或者皇位的继承而发生极大的波动。领袖人物和政府对经济可以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吴老的研究非常好，他说"康熙萧条"并非完全由于海禁，"实与康熙俭约治国，集中管理财政的紧缩政策分不开。雍正继位，耗羡归公和大量发放养廉银，情况即为改观"。郭成康教授对此深有研究，他在避暑山庄给我指出了要害问题。你看！康熙帝盖的房子这么俭朴，

而乾隆帝盖的房子就很豪华了。所以，我想乾隆帝与和珅一起搞了很多工程，多搞工程就要放松银根，就不存在紧缩了。由此可见，政府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能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所在。

这不仅仅是中国特色，东亚许多国家大抵也都如此。朱荫贵教授刚才谈的中日比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北大的陈振汉先生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宏观趋势时提到四个因素，一是政府，二是资本，三是劳动力，四是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由此我就想到这些因素都应在我们宏观经济趋势和总体评价的涵盖里面。所以，吴老昨天提出的结构主义方法，这确实是研究清代经济宏观趋势和总体评价的一个好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操作起来可能要比计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还要更加困难。因为结构主义的方法最后还是要遇到一个量的问题。比如方老先生昨天说到的三个产业结构的问题，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首先就是一个量的关系。因此，最终还是要考察量的关系。所以，吴老提出的结构主义方法与麦迪森的方法好像并不矛盾，麦迪森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结构的问题。但是，结构主义方法对于计量方法来说，毕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方法。因为只有做了计量的分析以后，才能做结构的分析。比如刚才人口史学家姜涛教授讲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结构问题，首先不就是一个量的关系问题吗？

总的说来，这次研讨会在讨论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问题时，在研究方法论上也是有所突破的。

第三点，关于“驼峰型”和“翘尾巴”的问题。

这次研讨会讨论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对清代宏观经济的总体评价究竟是以“驼峰型”来加以概括还是以“翘尾巴”来概括。我认为“驼峰型”和“翘尾巴”的两种概括应该是互补的，都有道理。

首先是从定量研究角度来看，“驼峰型”的概括是站得住脚的。据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的研究，170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是 828 亿元（1990 年“国际元”下同）发展到 1820 年达到 2286 亿元，120 年间增长了 176%。相同年份的欧洲，尽管那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也不过是从 926 亿元增长到 1826 亿元，只有增长 99.9%。中国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欧洲要快七十六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在二千多年传统社会的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当然从 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起，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基本趋于停滞了。据麦迪森的研究，1850 年中国的 GDP 是 2472 亿元，达到峰值，1870 年跌入低谷，只有 1897.4 亿元，然后缓慢回升，1880 年为 2053.79 亿元，1890 年为 2181.54 亿元，1913 年为 2414.31 亿元，尚未恢复到 1850 年的水平（引者注：对于这些数字，中译本排印有错误，现据英文本第二版订正）。而且，麦迪森认为 1820 年至 1952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负增长（-0.10%）。清代宏观经济的这一走势，也可以从清人法式善在他的《陶庐杂录》中所记载的户部存银的数量中得到间接的证明。据这本书的记载，康熙六年的户部存银仅有 248 万两，康熙二十五年达到 2600 多万两，康熙六十年为 3200 多万两，雍正八年达到 6200 余万两，乾隆二十九年下降到 5400 余万两，但到乾隆三十九年又增加到 7390 万两。由此可见，“驼峰型”的概括确实为历史数据所支持。

其次，从量的角度考察晚清中国经济有没有翘尾巴，我觉得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刘佛丁、王玉茹教授的数量研究表明 1887 年后，中国的 GDP 出现正的增长，这是可信的。因为，道光萧条，还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社会动乱，确实导致了社会经济的衰退，这是历史的事实。麦迪森认为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820 年后的负增长，也已经考虑了这些因素。由于对“道光萧条”以来中国经济详尽的定量研究目前尚付阙如，所以 1887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能够弥补“道光萧条”以来六十七年的衰退？目前只能存疑。我觉得这应该理解为恢复性的增长。麦迪森的上述研究表明清末中国的 GDP 虽有增长，但尚未恢复到 1850 年的水

平。如果考虑到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的巨额对外赔款，晚清中国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下降的。所以，“翘尾巴”的概括是否能在数量上得到证明似乎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证据，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我认为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晚清经济肯定是“翘尾巴”的。方行先生关于清朝灭亡的观点很有创见也很精辟，他认为清朝不是灭亡于异族入侵，也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而是灭亡于资产阶级革命。既然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话，就说明晚清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所以，我认为方老先生实际上也是赞成“翘尾巴”这样的概括的。根据定性分析，“翘尾巴”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比如洋务运动引进新的技术，出现新型的企业、银行，轮船、铁路、邮电等等的发展，比如晚清新政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如《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公司律》、《商人通例》、《破产律》《呈请专利办法》等经济法规的颁布等等。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从 1861 年的自强新政开始的，而且我通过研究世界经济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工业化启动后过了六十年左右就是一个动乱期。如英国在 1770 年开始工业革命，由此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法国的工业化大致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大约过了六十年左右以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英法等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就空前的激化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调查与研究。其结果是产生了共产主义同盟与《共产党宣言》，紧接着就爆发了 1848 年的欧洲革命。俄国的工业化基本与中国同时，开始于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过了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到 1917 年俄国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十分成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俄国的历史还没有磨出将来用以烤制社会主义的小麦馅饼的面粉来”。但是，列宁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研究，认为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已经存在，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革命而夺取政权。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起步以后，经过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其工业化不甚成功，但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孕育出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既然有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出现，那么当时的中国经济当然就可以用“翘尾巴”来加以概括。但是，这个“翘尾巴”还需要深入研究。翘的是龙尾巴、狗尾巴还是兔子尾巴，这却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研究呢？因为，新因素里面有制度变迁的东西和技术变迁的东西，而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都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陈启源在广东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营机器缫丝厂“继昌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陈启源早年离家到越南经商，学到了法国先进的蒸气缫丝技术。1874 年陈启源引进了法国先进的蒸气缫丝机器，通过种种妥协的方式，最终在他的家乡广东南海县创办了“继隆昌”。随后，南海县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夺走了手工缫丝业的原料，而手工缫丝业的衰落又使得手工丝织业失去了原料。由此引发了 1881 年南海县丝织业手工业者的骚乱。他们焚毁了一家机器缫丝厂，还企图焚毁陈启源的“继隆昌”。结果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县衙门一方面平息了丝织业手工业者的骚乱，另一方面下令陈启源的缫丝厂关闭三年。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所造成的不适应症状。后来陈启源通过改良，将原有的手工缫丝机改进为脚踏缫丝机，形成了机器缫丝与手工缫丝的二元格局，才为民众所接受。既然有这么一个适应过程，那么刚刚引进的新制度与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就要打一点折扣。

总的来说，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的研究要考虑各种因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有量的，要有质的。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历史延续的因素，要全面地看问题。

最后，你们可能要说我“和稀泥”。其实，我“和稀泥”也有“和稀泥”的道理。从历史延续性的视域来看问题，没有乾隆的“高峰”，哪来晚清的“翘尾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研究世界经济史，就发现工业革命的因素起源于十四世纪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中孕育出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如经济的现代性就有斯密动力、市场配置资源、产权激励，还有天赋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人生来就有追求幸

福生活的权利，就有占有财产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些大概是罗马法的精髓所在。此外，还有经济伦理，勤勉、信用、守约、天职等等。

乾隆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现代性因素。如斯密动力，加州学派认为中国经济在乾隆时期已经存在斯密动力这个因素。我通过研究，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市场配置资源、产权激励等等，也是存在的。如龙登高教授的研究，就说明当时的土地产权制度能够对土地资源进行极有效率的优化配置。为什么乾隆时期中国经济能够登上高峰？关键就是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某些现代性的因素。

既然有这些现代性的因素，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刺激下，不大可能立即出现工业化。但外界的因素一进来我们之所以马上就能做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着某些现代性的因素了。杜恂诚教授昨天提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我也有同感。这个“反应”确实已经考虑到内部因素。为什么中国人的反应是洋务运动、日本人的反应是明治维新。印度人的反应呢？南美人的反应呢？非洲人的反应呢？都是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因素不同。

总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晚清“翘尾巴”，就是因为乾隆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高峰”时所出现的经济现代性，后来就在晚清“翘尾巴”中起了作用。所以我认为以上两个概括是不矛盾的。

第四点关于中国经济史上的市场经济问题。

探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和总体评价的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经济的问题，我们纂修《商业志》肯定也要涉及市场经济的问题。我感觉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一种迷信，好像一谈到市场经济就非常好，其实市场经济也有不好的地方。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上台都同市场经济有关系。另外市场经济还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市场经济，一种是坏的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而与专制特权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治传统，没有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建立在法治社会之上的。中国到了今天才有《物权法》。过去哪有《物权法》，都是皇帝说了算！我年轻时读白居易的《卖炭翁》，深有体会。我为“卖炭翁”深感不平！这个“卖炭翁”确实具有韦伯所说的那种新教伦理的精神，一是他勤劳，“伐薪烧炭南山中”，弄得“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在所不惜。二是他有经济理性和经营头脑，他的炭早不卖晚不卖，非要到下了大雪才卖。因为此时炭的效用最高，可以卖个好价钱。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小农或者手工业者！像这样的人，如果在美国不能当资本家，那么“小康”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却不行！你碰到了“黄衣使者”，他们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就把“千余斤”的“一车炭”给拉走了。这是不等价交换！正规的市场经济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我们既要看到它具有现代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有中国特色的一面。不过这是负面的中国特色，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历史惰性。

人活在世界上，肯定要追求一个目标。但我觉得仅仅将追求一定的目标作为整个人生，有时是会很痛苦的。其实，存在主义也是不错的。存在与时间才是人生的关键，我们今天有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又有时间做科学研究，应该感到很幸福！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所以郭成康教授让我做总结，我就做了。当然我这个总结不成功，只是狗尾续貂而已。